

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

熊政宇 张飞云^{通信作者}

新疆农业大学，乌鲁木齐，830052；

摘要：本文基于2024年东中西部三地（新疆本布图镇、重庆李溪镇、山东尚堂镇）农户问卷数据，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土地流转通过释放劳动力与优化资源配置显著影响农户生计，但区域异质性显著。东部地区依托非农就业实现收入跃升，中部受限于土地破碎化，西部则面临生态约束与隐性矛盾。土地转出提高非农收入（金融资本），转入则增强自然与物质资本。建议构建“区域一生计”协同政策框架，通过差异化流转机制提升农户生计韧性。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户生计；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区域差异；空间异质性

DOI：10.69979/3041-0673.25.08.060

前言

国内外土地流转研究呈现显著差异，国外多基于土地私有制探讨土地交易机制。如美国通过财政政策调节流转，法国依托法律法规推动规模化经营。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农户经济利益驱动的内生动力。国内研究聚焦政策效应，地方政府通过资金支持与项目引导促进适度规模经营，但区域经济差异可能导致“双农分化”风险。

土地流转通过释放劳动力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农户收入，但其效应受生计资本差异制约。国外研究强调产权明晰的长期影响，国内则关注资源再配置的短期效益。土地转入增强自然与物质资本（依赖农业收入），转出则提升金融与人力资本（依赖非农就业）。区域异质性显著，东部因工业化程度高更趋集约化，中西部受限于原始资本薄弱与政策适应性不足，流转效益较低。

在农业强国战略背景下，土地流转成为破解小农经营困境、推动规模化的关键路径。然而，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导致流转效益存在显著空间分异：东部土地集约化程度高，中部受制于细碎化耕地，西部面临生态保护与开发的矛盾。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区域，缺乏多尺度对比分析。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选取东中西部村镇，从人力、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五类资本维度，对比分析东中西部村镇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为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依据。

1 问卷设计及发放情况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研究区农户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农户基本情况；第二，农户的土地流转情况；第三，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本文主要选择有流转土地行为的农户进行随机发放问卷。为了对比分析不同区域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本文选取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下尚堂镇（东部平原农区）、重庆市酉阳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李溪镇（西南山地民族聚居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本布图镇（西北生态脆弱区）为研究区，每个镇随机抽取了5-7个村，每个村随机抽取20-30户开展调查。

调查共发放问卷360份，最终收回问卷335户，剔除无效样本及关键变量缺失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317户，占样本总数的95%。其中山东地区有效问卷112份，重庆地区103份，新疆地区地区125。

2 结果分析和讨论

2.1 农户的基本情况

总体分析研究区农户男性占比比较大；年龄大多在55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大多数为小学，文化程度较低。农户个体差异会直接影响农户原始生计，从而影响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农户个体差异会对其原始生计资源产生直接作用，进而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对农户生计变迁的影响机制产生差异化效果。

2.2 农户的土地流转情况

2.2.1 农户流转情况

由于时间维度上考虑到土地流转前后跨度太大难以收集数据，故仅对比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和不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生计状况，所涉及的时间（2024年）为调研年份。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分析，新疆、重庆、山东三个研究区均有较高比例的土地流转行为，研究区的农

户大多以流出为主，所以本文主要探究土地流出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从流转合同形式分析（图1），三地的选择呈现出明显差异，新疆研究区的农户几乎都使用书面协议，重庆研究区则相对灵活，山东研究区的书面协议比例非常。

书面协议的高占比反映了农户对正式合同的高度依赖，结合政策背景分析，三地差异可能与地方政府对土地流转的规范力度及市场化程度相关，规划的流转有利于农户生计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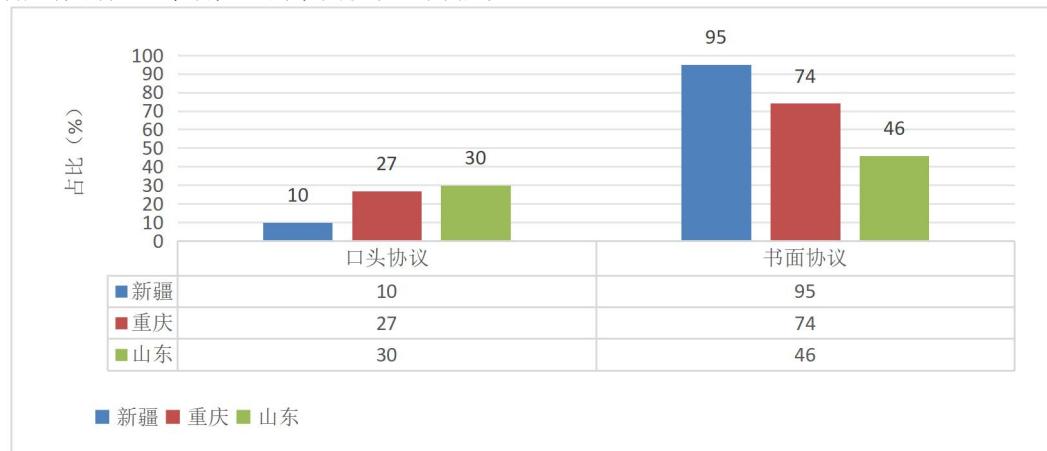


图1 土地流转合同签订情况

经线下调研，该差异还与三地合作社参与度不同有关。新疆研究区合作社多、农户承包地广，流转市场活跃，农户熟悉法规，土地流转对生计积极影响大。重庆研究区仅有少量合作社参与。山东研究区农户个体承包地少，重经济利益，土地流转市场滞后，对农户生计推动作用有限。另外，新疆的土地流转后依旧作为农业生产，开展粮食的种植；而重庆研究区主要开展花卉种植，发展商品经济。这一现象引发了对农用地流转中“非粮化”倾向的反思，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明显，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粮食种植和粮食安全。

2.3 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2.3.1 土地流转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通过图2可知，返乡大学生数量上，三地呈现出明显差异。新疆研究区返乡大学生比例较为适中，57%的家庭有1-2名返乡大学生。重庆研究区返乡大学生数量最多，64%的家庭拥有3名及以上返乡大学生，这一高比例返乡现象，既得益于地方政府吸引人才返乡创业的政策引导，也契合当地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山东研究区返乡大学生数量最少，仅有26%的家庭有1-2名返乡大学生。该地大学生返乡比例相对较低，或许与当地农民对务农意愿较低，也与整体非农经济发展为主有一定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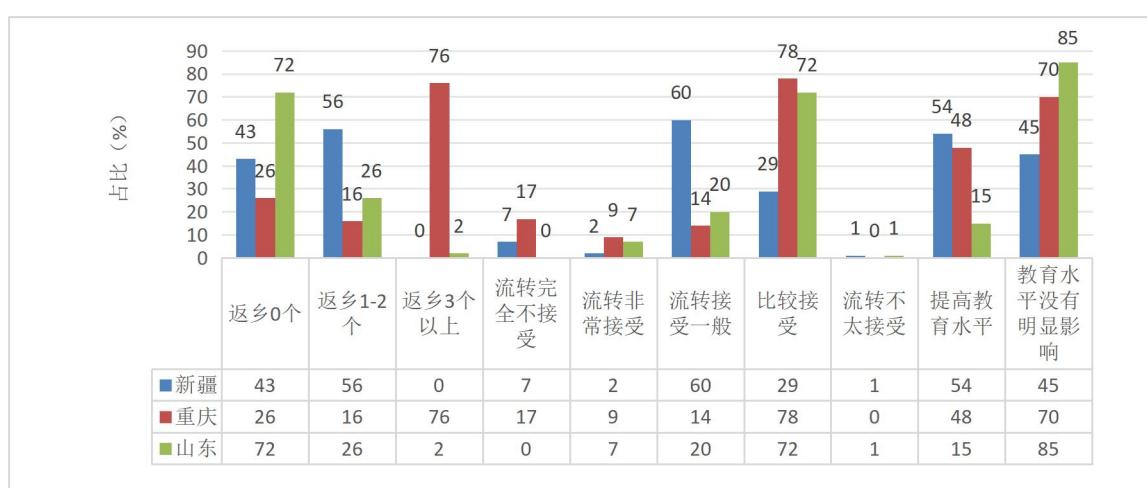


图2 土地流转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土地的流转接受程度上，新疆农户则表现出相对保守的态度，而重庆和山东研究区的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接

受程度更高。新疆研究区61%的农户持中立态度，29%表示积极接受。重庆与山东农户的接受度较高，分别达

66%和72%。这种差异与各地经济发展、非农就业机会有关，经济好、机会多的地区，农户接受度高，能借流转优化生计，反之则难。

教育水平影响上，新疆55%的农户认为流转有益，因经济收益可用于教育投资。重庆41%的农户认可流转提升教育水平，这与当地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教育依赖政府扶持有关。山东85%的农户觉得流转对教育无明显影响，可能因为山东地方政府对教育比较重视，对教育投资扶持程度大，所以农民对教育投资的需求较小。流转收益未能有效转化为教育投资，据研究区反馈与传统观念、经济模式制约有关。

整体而言，三地返乡大学生数量少，对土地流转接

受度一般，使得土地流转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有限。这主要受各地土地收益低、传统教育观念束缚（认为上大学就应脱离农业）以及返乡大学生投资倾向于城市新兴产业等因素影响，最终制约了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的改善效果。

2.3.2 土地流转对自然资本的影响

通过图3可知，农地平整度上，三地农地平整度差异显著。新疆因牧区/农区交错评价分散。重庆受丘陵地形限制，42%农户反馈“不平整”。不平整的土地制约农业机械化与规模化生产，阻碍农户生计提升。山东平整度高，66%农户认为“平整”，利于机械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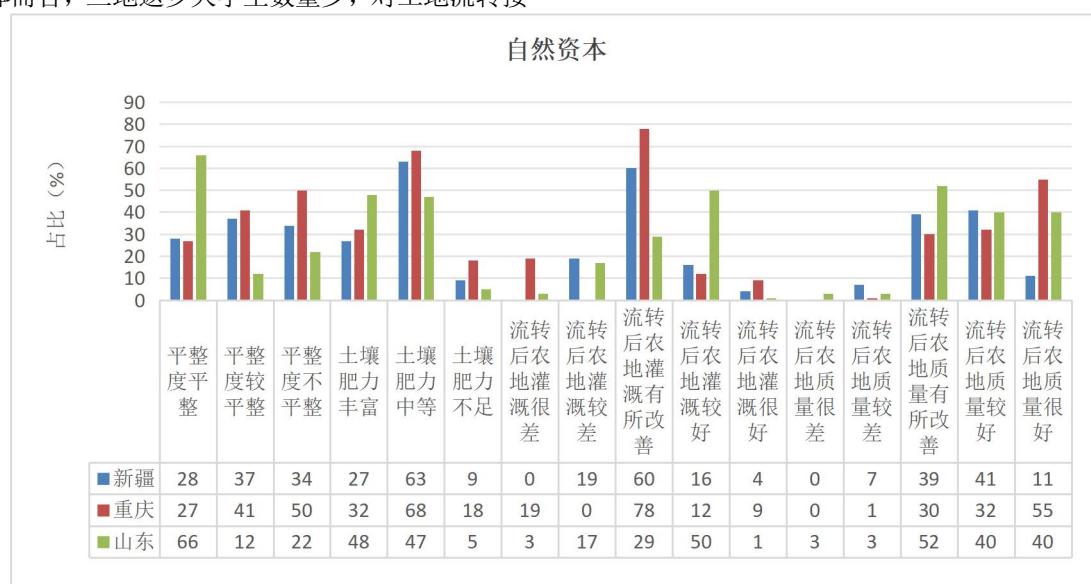


图3 土地流转对自然资本的影响

土壤肥力上，新疆、重庆多为中等肥力，山东相对较高48%农户认为肥力丰富。肥力影响作物产量，山东农户因土壤优势更具生产优势，而新疆、重庆农户需更多投入，影响生计成本与收益。

流转后灌溉条件上，新疆、重庆大部分农户认为有改善，但重庆16.1%农户认为条件差，影响农作物生长，不利于农户提高生计水平。山东最佳，50%农户认为好，可能得益于该地的社会化经济发展和大机械耕种。

农地质量评价上，新疆42%农户认为质量较高；重庆好评比例最高，但地形破碎影响规模化经营；山东评价多元。高质量土地可提升农户收益，有效改善生计。

从整体上看，三地原始生计自然资源受地理位置环境影响较大，重庆丘陵研究区土地多破碎，因此原生土地条件较低，但是三地农户在农地流转后普遍认为质量转优，因此土地集约化利用对质量提升具有正向作用。虽然从农户承包地数量角度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自然资源是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农地的可持续发展也有正

面影响，但具体来说还是要结合当地地理位置和状况因地制宜。

2.3.3 土地流转对物质资本的影响

通过图4可知，流转后机械化作业水平上，山东研究区在机械化提升方面效果最好，而重庆研究区存在一定的下降情况。农户对于机械化水平的判断大多依据的是流转后，合作社或者社会企业等对于土地的影响，这些影响虽然不直接关系到农户但是与可以通过土地的可持续性让农户收益。新疆30%的农户认为机械化作业水平大幅提高，40%的农户表示有所提高，但29%的农户认为基本不变，表明该地的机械化发展在土地流转后有所提升，但仍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农户机械化水平没有显著变化；重庆研究区50%的农户认为机械化水平有所提高，但14%的农户反馈机械化条件下降，可能因地形或资源限制，机械化条件下降，与地形破碎导致的农机适用性不足有关；山东研究区46%的农户认为机械化大幅提高，54%表示有所提高，这表明该地机械化水平在土

地流转后得到显著改善，机械化推广效果较为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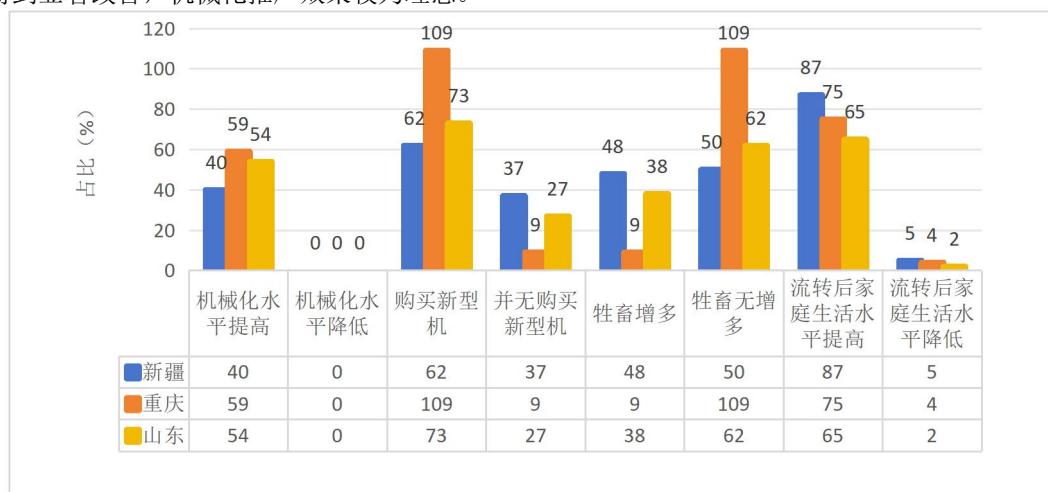


图4 土地流转对物质资本的影响

新型机械装备购置上，重庆研究区购置新型机械装备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研究区，反映出对现代农业设备的强烈需求。新疆研究区63%的农户购置了新型机械装备，显示出一定的机械化投资意愿；重庆研究区购置新型机械装备的比例最高，达到92%，显示出重庆研究区农户在机械化装备上的高投入，可能与地形条件改善或政府补贴政策有关；山东研究区73%的农户购置了新型机械装备，比例较高，表明该研究区机械化推广的接受度较高。

牲畜数量上，新疆研究区比起其他研究区增加牲畜数量的农户比例最高，反映了该研究区在畜牧业方面的依赖。新疆研究区48%的农户增加了牲畜数量，显示出畜牧业在农业中的重要性；重庆研究区仅8%的农户增加了牲畜数量，说明该地在农业结构上可能更偏向于机械化和种植业；山东研究区38%的农户增加了牲畜数量，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畜牧业发展需求。

2.3.4 土地流转对金融资本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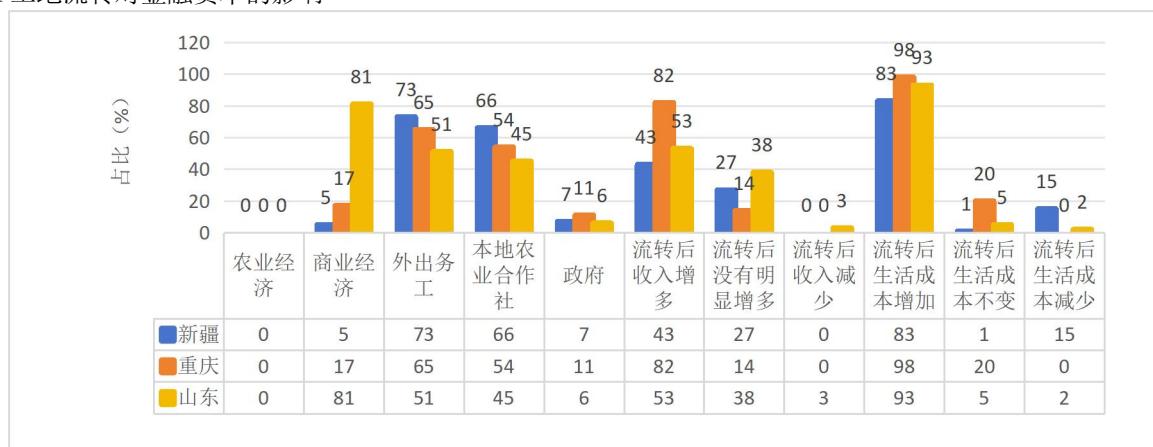


图5 土地流转对金融资本的影响

流转后收入上，新疆和重庆研究区收入增多的效果

最为明显，而山东研究区增收效果相对较弱。新疆研究

区44%的农户表示明显收入增多，29%认为没有明显变化，收入增加的情况较为均衡；重庆研究区69%的农户认为收入增多，仅13%表示没有变化，显示出土地流转对收入的积极影响；山东研究区53%的农户认为收入增多，但38%认为没有明显增多，这表明土地流转对山东研究区的收入影响较为有限。

流转后生活成本上，三地生活成本增加比例均超80%，其中重庆最为突出。新疆研究区83%的农户表示土地流转后生活成本增加，15%认为有所减少，1%认为无明显变化，反映出生活成本压力普遍存在；重庆研究区98%的农户反应生活成本增加，20%认为成本不变；山东研究区93%的农户生活成本增加，仅2%认为减少，5%表示无变化，成本上升问题在三地中虽略低于重庆，但仍对多数群体形成负担。

农户土地流出土地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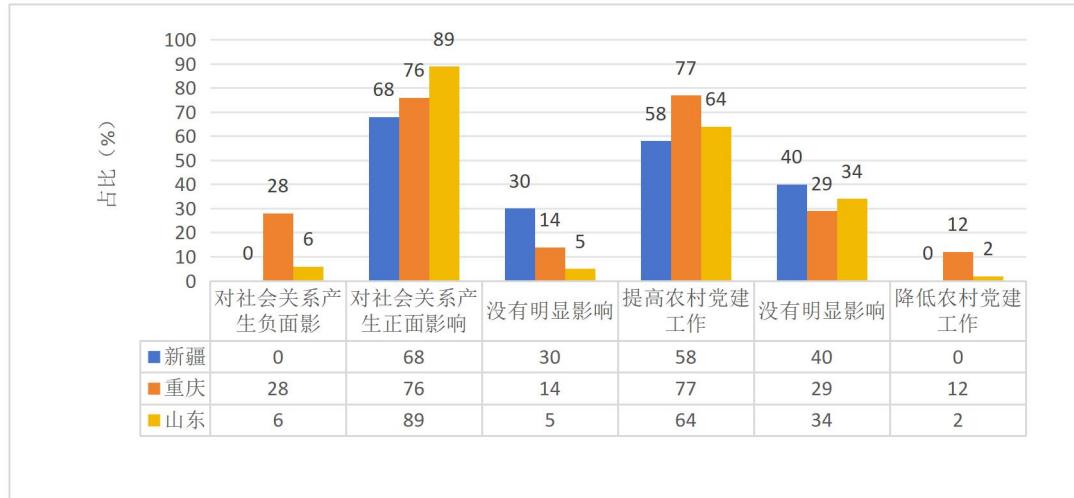


图6 土地流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农村党建工作上，土地流转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呈现地域差异，但是总体是提高。新疆（69%）与山东（89%）农户认为社会关系改善显著，而重庆24%的农户反馈负面效应。这一结果或与流转过程中利益分配机制差异有关。

3 提高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正面影响的对策建议

基于区域差异与生计资本分化的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差异化政策建议：

构建区域特色流转机制，强化政策适应性。首先东部地区，依托工业化优势，推动土地流转与产业融合。完善非农就业支持体系，引导土地流入方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如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并通过税收优惠吸引

了自己自主的小农经济，一些农户因为外出谋生生活圈子的变化也会增加生计负担，但是总体上土地流转对农户金融资本是正向影响，流转后产生的多元收入增加了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日常生活成本支出。

2.3.5 土地流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通过图6可知，社会关系上，三地研究区的农户普遍认为土地流转对社会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新疆占比69%，重庆占比76%，山东占比89%，说明土地流转促进了村民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在土地转让的过程中，村民之间可能产生更多的交流与互动，从而提升了社会关系的质量。少部分农户反馈负面效应。或与流转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的矛盾相关，需通过完善纠纷调解机制加以规避。

社会资本参与规模化经营；其次中部地区，重点破解土地破碎化问题。整合零散地块，推广“土地托管+合作社”模式，通过财政补贴鼓励连片经营，提升机械化水平；同时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如灌溉系统）建设；最后西部地区，注重生态保护与生计平衡。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限制高耗水作物种植，支持农牧结合型流转模式；加强合作社规范化管理，避免流转后“非粮化”倾向加剧隐性矛盾。

强化社会保障与就业衔接。将土地流转农户纳入灵活就业社保体系，优先覆盖医疗与养老保险；在县域内建立“土地流转—用工需求”信息平台，促进非农就业本地化（如农产品加工、物流等），减少外出务工导致的空心化问题。

4 结论

本文通过东中西部三地的实证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东中西部梯度差异,东部非农驱动、中部土地约束、西部生态矛盾,揭示了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土地流转通过差异化路径影响生计资本。土地转入显著提升自然与物质资本(如农地质量、机械化水平),而土地转出通过释放劳动力增加金融资本(非农收入)和人力资本(教育投资)。但总体效应受区域经济水平、地理条件及政策支持力度制约。

区域分化特征显著。东部因非农就业充分,流转增收效果明显;中部受限于土地破碎化,需强化基础设施;西部虽流转规模大,但生态约束与隐性矛盾突出,亟需平衡开发与保护。

其中个体差异不可忽视:年龄、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导致农户对流转的响应分化,低技能群体易陷入“失地即失业”困境,需靶向政策支持。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多区域对比揭示了生计资本转化的空间逻辑,并提出差异化的“区域一生计”协同政策框架。然而,研究未深入探讨代际差异对流转决策的影响,未来可结合追踪数据进一步分析长期效应。

参考文献

- [1] 王欣桐,蒋国洲.发达国家农村土地流转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企业技术开发,2016,35(09):148-149.
- [2] 许佳慧.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不均等的影响机制研究[D].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23. DOI:10.27133/d.cnki.

i. ghbyc. 2023. 000063.

[3] 施海波. 土地禀赋、政策支持对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变化的影响研究[D]. 安徽农业大学, 2018. DOI: 10. 26919/d. cnki. gannu. 2018. 000009.

[4] 田益多. 生计资本对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的影响[D]. 华中农业大学, 2021.

[5] 王卫雯. 乡村人居环境与农户生计资本视角下土地流转行为及区域差异研究[D]. 中国地质大学, 2022. DOI: 10. 27492/d. cnki. gzdzu. 2022. 000120.

[6] 薛清水,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网络监管平台. 山东省,青岛太阳软件有限公司, 2020-05-23.

[7] 王亚运.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研究[D]. 华中农业大学, 2018.

[8] 姜国忠,罗盈婵. 我国土地流转“非粮化”现象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03): 146. DOI: 10. 13246/j. cnki. iae. 2021. 03. 013.

[9] 朱长宁. 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经济行为研究[D]. 南京农业大学, 2014.

[10] 樊立惠,苏铮,吴军,等. 旅游型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核心力量叠加过程及多维效应——以沂蒙山区竹泉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24, 43(11): 3007-3026.

[11] 宋鑫,孔卫,李香玉,等. 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J]. 农村科学实验, 2025, (03): 9-11. DOI: 10. 20264/j. cnki. rse. 2025. 03. 005.

[12] 江立君. 耕地宜机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 机理与实证[D].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4. DOI: 10. 27630/d. cnki. gznky. 2024. 000141.

[13] 孙元元. 农村劳动力再就业现状及对策[J]. 现代农村科技, 2024, (09): 144+151.